

非经济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个欠发达社区的考察报告

李善峰 蒋志坚 纪长胜

经济发展离不开正确的发展战略。而发展决不限于经济学家所指的工农业产值、国民收入、劳动生产率、生活质量等指标的增长和跃升。从一个宽泛的意义上来说，它是整个社会、经济、文化、风俗习惯等包括所有意识形态因素在内的各种要素的综合变迁。在相当一个时期内，我们在制订经济发展战略时，过多地注重经济因素，往往忽略了影响经济发展的社会机体深层的非经济因素。然而，非经济因素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影响和作用并不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最近，我们在山东省部分地区进行了调查、分析和研究，发现在一些欠发达地区非经济因素对社会经济发展起着无形然而却是十分有效的扼制作用。本文试图把临沂地区作为一个个案，来分析制约社会经济发展的非经济因素，并在此基础上选择社区未来发展的对策。

一、社区背景的透视：历史积淀对人的观念的局限

“社区”是社会学的一个基本的分析社会现实的概念工具。我们将利用这一工具，对临沂社区的社会现实进行较为系统的考察。

临沂地区经过建国38年的建设，社会、经济都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但放在全省、全国的大系统中看，仍是各方面的效益比较低下的欠发达社区，尚未完全突破长期以来形成的低质落后的经济格局。尽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搞活的战略方针为临沂地区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石臼港、兖石铁路的建成使用又打破了该地区长期封闭的格局，但长期以来历史发展积淀而成的封闭社会经济格局一时还难以迅速改变。社会发展方向的全面转轨毕竟要有时间上的保证。据统计，建国38年，沂蒙山区的6个山区县仍有将近2000多个家庭人均收入在200元以下。

贫穷和荒凉并非必然地联系在一起，而是恰恰相反。临沂地区自然资源虽不极大丰富，但也不可忽视。在这块土地上，有着众多的自然资源。40余种主要的矿产资源在省内外占有重要地位，已探明矿产储量的有效潜在经济价值达1000亿元以上，兼容南北方动植物生态系统的良好环境，形成了丰富的农副产品资源。98公里的海岸线则是许多地区望尘莫及的。临沂地区是全省降水量最多的地区，水资源总量占全省的24%，人均占有789立方米，平均每亩耕地占有656立方米，均居全省首位。但是，这众多的自然资源至今还没有进行多层次的开发利用，仍处在卖原料和粗加工阶段。1984年全区矿业产值仅占全省的4%，人均占有矿产品采掘量仅为0.5吨，是全省平均水平的40%。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产值仅占农业总产值的24%，大大低于烟台53%的比例。尚待开发的资源和经济上的贫困处于尖锐的矛盾中。

贫困地区从根本上脱贫的必由之路,是依靠本地区的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然而,长期以来临沂地区封闭、半封闭的社区环境,使文化和各种现代化信息的传播受到时空的限制,从而决定了这块土地上人们的思想受传统的熏染和腐蚀,很难轻易剔除,思想观念呈现出一种严重的沉淀性与凝固性,使人们的心理和精神被牢牢地锁在传统意识中,难以接受现代文明的启示和影响。这种历史积淀对人的观念的局限无时无刻不对现实社会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传统因素对现实社会的影响,一般说来是通过人的观念这一途径实现的。

因此,经济的贫困并不可怕,可怕的常常是容易被人们忽略的适应社会发展的观念的贫困。人的观念是非经济因素中最深层次的存在,它一旦形成,就会对整个社会及其成员发生作用,表现为一种“集体无意识”,规范着人们的行动,制约着社会的进程。在这里,我们围绕着国民经济循环过程中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来分析传统观念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

1. 劳动观。在自然经济条件下,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低下,生产工艺的简单,生产工具的粗笨落后,人们的劳动全凭力气,其劳动观是出大力,流大汗,只有消耗了大量的气力,才算是劳动。这种劳动观念的存在,必然导致人们对知识和脑力劳动的轻视,对科学技术的排斥。目前,虽然人们的劳动观念有了某些转化,但由于自然经济长期的趋向性感应,临沂地区的农民采用的几千年形成的劳动习惯和操作方式,还一时难以改变。生产由粗放经营向集约化经营的转化还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在工业生产方面,目前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在生产中消耗的比例为9:1,乡村企业仍以体力劳动为主。从县属以上工业企业情况来看,据1985年调查,主要生产车间工人中,手工操作工人占29.6%,半机械化操作占30.2%,机械操作占17.9%,自动控制作业的仅占0.7%,就是仅有的这点自控作业还都是集中在电力工业方面。这其中除了有各种客观条件的局限外,传统劳动观不能不算是一个潜在的制约因素。这种传统的劳动观必然影响新的生产和生活领域的拓展,降低生产力的使用价值。

2. 分配观。目前,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公民面临的各种机会是不均等的。因此,同样的投入,由于机会的不均等,功绩自然不会一样,若按功绩的大小来分配收入,就会使机会少的人感到吃亏。象农村承包以及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都或多或少地存在这种情况。临沂地区农村承包的果园等,大多数都是由原来的公社社员集体栽植的,承包时按当时的产量、价格和今后大致的发展趋势包给了少数人,果园进入盛果期后,产量、价格成倍上涨,承包人收入猛增,由于承包机会不均等,群众意见很大。从整个社会范围内来看,为了使自己的报酬指数与别人的相等,在机会不均等的条件下,就会利用传统的思维方式,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原始平均主义思想来进行以牺牲效益为特征的“攀比”。这在目前的企业和机关表现得尤其显著。厂长晋级按3%轮转,奖金均分无不如是。现实情况是,凡是促进效率的分配都被认为是不公平的,而能体现所谓社会公平的分配却又是影响效率的。不难看出,这种两难困境是以视收入均等为社会公平的观念为前提的。它毋庸置疑地会影响人们生产积极性的发挥,影响社会财富的创造,进而在总体上影响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各个环节。

3. 交换观。按照商品经济的观念,经济活动的四个环节是紧密联系在一起。从某种意义上说,交换本身就是生产。然而,由于受长期自然经济的影响,临沂地区也和全国大多数欠发达地区一样仍然存在着重生产、轻交换的思想认识。直到不久前,还有不少人认为经商做买卖是不务正业。1978年临沂地区农业的商品率为24%,比全省平均水平的32%低8个

百分点,到1986年,全区农业商品率虽然提高到40.9%,但和全省平均水平57.3%相比仍相差16.4个百分点,差距越拉越大。在这里,观念的陈旧不能不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临沂地区目前全部工业产品的产值中,国家统配的产品仅占10—15%,绝大部分工业产品需靠市场调节来组织生产。农副产品除粮食国家按合同收购10%左右外,其余各种农产品基本全部放开,由市场按价值规律进行调节。交换已成为制约全区经济发展的关键性因素。而目前从工业企业到农村各业,从干部到群众,大多数人仍旧以完成生产任务为主要经济活动目标,商品观念、交换观念极为淡薄,适应不了当今社会急剧变化的市场需求,往往造成原料的不足和产品的积压,影响生产的正常进行,挫伤干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从另一方面看,临沂地区每一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占有耕地3.13亩,低于全省4.44亩的平均水平,居全省各地、市倒数第一。人多地少,必然要求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化。据统计,扣除乡镇企业吸收的部分劳力外,目前全区还有100多万农村剩余劳力需要转移出去,农闲季节可供转移的高达300万人。而现实却是,在农村劳动力中,从事第二、三产业的人数仅占农村全部劳力的18%,大量的劳力仍被束缚在有限而贫瘠的土地上,导致生产要素组合的不合理,这里既有劳力转移门路和转移资金的问题,还有不愿离土经商的传统观念的影响。欠发达地区农村长期以来处在封闭与半封闭的环境中,“土货不出,外货不入”,商品经济不发达,商品观念淡薄,尤其是长期以来不注重交换和流通,农民缺乏应付市场变化的素质,使市场行为带有很大的盲目性。目前,全地区从事流通服务的人数占从业总人数的比重还不足10%,这种状况已使全区不少工农业产品不能及时进入流通和消费领域,严重制约了经济的发展。因此,树立正确的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交换观念,已成为临沂地区社会经济当务之急。

4. 消费观。在商品经济社会中,人们追求幸福的手段是提高欲望,从而增加创业冲动和创造力,增加社会财富,以此增加享受,来达到高层次的快乐。但在自然经济下,人们追求幸福的手段则是缩小欲望,以求得低层次的满足,并以此自乐自快。这种节制型的幸福观,使人们不求进步,不思改革,容易在低层次上得到满足而不再孜孜以求。谈不上创业精神,更不去积极努力创造尽可能多的社会财富。这种以“穷”为荣,以“苦”为乐的观念,不仅束缚和障碍人们对新生活的追求,也必然制约着生产的发展。1986年,临沂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366元,人均生活消费支出258元,生活消费率为71%;而同期全省人均纯收入449元,人均生活消费支出365元,生活消费率为81%,差距是明显的。然而就在这种生产不够发达,消费水平低的社区内,却令人迷惑地出现了超出常规的高消费,这就是在婚丧嫁娶时进行的炫耀性消费。据临沂地区有关部门选点调查,从1986年10月1日—1987年5月1日结婚的274个家庭中,开支为7000—9000元的55户,占20%;4000—6000元的187户,占68%;2000—3000元的32户,占12%。结婚请客,一次就有一、二百人,花费数千元。丧葬中大破费的现象也极为普遍,一般的小丧葬,办酒席70—80桌,大丧葬高达百余桌,花费千元左右。为了一次体面的婚嫁丧葬,往往要花费数十年清心寡欲的积蓄,甚至全家举债。这种小农经济观念体系造就的低创业冲动和炫耀性消费直接影响了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的发展。

不难看出,欠发达社区人们的观念在某种程度上与商品经济的要求发生冲突,观念的陈旧和不变,导致社区的整个价值选择囿于传统的小农经济体系,使生活方式长期以来不能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难以产生一种新的适应经济发展的社会风气,虽然近几年的农村改革,调动了广大农民发展商品经济的积极性,但前一阶段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靠传统经济手段和破坏自然资源来实现的。

二、社区功能的弱化：运行中的摩擦与效益损耗

社区功能是指整个社区在经济、社会、行政等方面的服务、协调和管理所带来的运行状态。一个社区的功能是由人、信息、资金、物资等的流动形成的。这些社会基本要素的流动频率越高，流量越大，则社区的功能越强，与此同时，社区内部的体制更新和人的观念更新也越快，反之则弱。我们从商业设施、金融机构、生产服务、技术服务、工商管理、信息沟通、行政管理等方面分析临沂地区的吸收与辐射功能，发现联系松弛的诸要素所构成的低质结构和基本上由行政手段维系其运行的社区功能，有着不容忽视的运行摩擦与效益损耗。

高度的社区同质性使社区总体功能先天不足。从全国范围来看，由于大规模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只有30几年的历史，这中间又有几次大的失误，全国目前的工业化水平还较低，在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社会管理、教育、科技等方面，还比较落后。单一的农业经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占主导地位，经济关系的简单，导致社会结构的同质性很强，加上自然经济的封闭特征和闭关自守的政策，使我国经济没有加入到国际经济大循环中去，从而形成了国内各个社区自给自足、独立发展的封闭格局，影响了社区整体功能的发挥。临沂地区是典型的传统农业社区，在这方面的特征较其他地区更为明显。1986年，全区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5.9%，比全省平均水平12.6%低6.7个百分点。单从农村来看，1986年农村劳动力中，从事第一产业的占85%，比全省平均水平76.4%高8.6个百分点；从事第二产业的占8.2%，比全省平均水平13.5%低5.3个百分点；从事第三产业的占5.2%，比全省平均水平8.2%低3个百分点。临沂地区第二、三产业欠发达，导致多数农民仍被束缚在土地上，从事传统的农业生产，形成社区内部欠合理的分工分业，由于社区内部的高度同质性，使社区的每个成员不存在更多的选择机会，他们在社会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上也无多大差异，在社会组织与社会关系上，仍以血缘关系为主。活动空间主要限于家庭、邻里、朋友之间，没能超过社会学上所说的“初级社会群体”这个范畴。人与人的互动以面对面的方式进行，碰撞频率很低，在此基础上以血缘、情感为主要纽带产生的户办、联户办企业，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优化了产业结构，向我们透露了一些现代化信息，但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小生产的经营方式和家庭本位主义。建立在纯理性基础上的相互利用、合作、竞争、协调发展的商品经济活动还没有形成主流。社区成员的不流动，堵塞了各种信息的通路，使本来就封闭的环境更加封闭，强化了社会基础结构的自然性质，致使人、信息、资金、物资的流动不畅，社区内聚力不足，无法有效地开发和利用社区内丰富的自然资源。

在县、乡一级社区内，小城镇及市场网点是社区成员的主要活动中心，一些比较大的经济、文化活动基本上在这里进行。故这里形成了较多的人流、物流、信息流，他们之间的碰撞频率也较高，信息传播较快。人们在这里可以拓宽视野，接受新事物，学习新经验。因此，一个地区城镇化水平的高低和市场网点的多少将明显地影响着社区的吸收与辐射功能。临沂地区由于城镇化水平低，市场网点少，导致社区吸收与辐射的功能明显不足。而且城镇的规模小、基础设施差，大多呈内向、封闭、自我服务的模式，吸引、辐射能力较弱。全区市场服务网点也较少，从高层次的大型专业市场来看，1987年底虽已发展到54处，居全省之首，并吸引了四方来客，但平均400多公里才有一个，且大多集中于相对发达的城镇，广大偏远的乡村则根本没有。从中层次的商业服务设施来看，1986年，全区有商业机构（不含个体）1.7万个，每万人拥有15.8个，低于当时全省17.4的平均水平；从事商业的职工为5.9万

人，每万人口仅占55人，低于当时全省72人的平均水平。相反，每一个机构服务的面积却是1.27平方公里，高于当时全省1.15平方公里的平均水平。由于服务面积大，其吸引、辐射功能相应地也较弱。而低层次的集市贸易虽遍及全区各地，但交换范围还囿于较小的区域，交换时间又受一定时间（一般每个集市都间隔5天）限制，故人们接触的新事物较少，信息量也有限，很难强化社区功能。

社会行政管理上的人为效率损耗。中国的改革正处在两种体制对峙的胶着状态，在旧体制向新体制转轨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某些管理上的失误和效率损耗，这是目前全国普遍存在的问题。在全国范围内的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全面推开，机构改革和设置尚未出台，各种关系尚未完全理顺的情况下，在象临沂这样的传统农业社区，其干部本身的素质对本地的改革进程和效率提高起着重要的作用。农村普遍实行“大包干”责任制后，原有的集体组织已不再作为农业经营主体存在，但乡、村仍作为经济生活中的实体发挥作用。村委会和乡政府，作为区域经济的人格化代表，在有组织地引导地区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过程中，其作用是无可替代的。一般地说，农村干部比普通农村居民掌握了更多的商品经济知识，但缺乏高层次的现代商品经济意识，相当一部分人停留在经验阶段。还有不少农村干部由于自身素质的局限和人事制度上的弊端，难以较好地发挥作用。我们在调查中发现，乡镇一级干部文化偏低、年龄偏大，是造成区域社会运行效率损耗的因素之一。另外，乡镇干部的频繁调动也人为地带来了效率损耗。有一个乡4年换了6次乡长，相当一些干部抱有临时思想，影响了工作的拓展。

三、社会发育的低下：基础结构的先天不足

临沂地区社会经济的现代化进程，是在一个起点非常低的社会经济环境中开始的。从整个社区系统的发育程度来考察，我们会找到人的观念的贫困与社区功能弱化的某些一般原因，而且还可以通过目前靠自然经济手段致富的乐观表象（临沂地区的发展速度，与原有的基础相比，并不低，甚至偏高），透视与先进地区的真正差距，以寻找开发的新思路。

1. 教育。基础教育是提高社区人的素质和转变观念的重要手段，它对形成和强化一个欠发达农业社区的区域性商品经济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总起来看，临沂地区教育设施较差，师资水平偏低，影响了本来就低下的人口素质的提高。据1982年人口普查，区内千人大学生、高中生、初中生、小学生分别比全省平均水平低2.2人、14.2人、41.8人、38.6人，而千人文盲、半文盲却比全省平均水平高85.5人。到1986年，全区平均每万人口在校学生，普通高中45.9人，普通初中381人，农业职业中学10.7人，小学1148人，前三类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全省分别为65.5人、423人、23.8人）。在三不通（不通汽车、不通电、不通广播）的地区，适龄儿童的入学率仅为86%，而且还不巩固，高、初中毕业生只占人口总数的2.2%，比全区的平均水平还要低9个百分点。职业教育、专项培训、业余教育等工作还刚刚起步。截止1986年底，全区13个县、市农业职业中学只有42处，在校学生11639人，仅占全区农业人口的0.011%。从师资情况看，1987年全区普通高中、初中、职业中学、小学的专任教师学历达标率分别为23.38%、18.56%、9.97%、64.17%，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全省分别为28.26%、19.18%、18.44%、68.7%）。

2. 群众文化。对于远离中心城市文化辐射的社区来说，群众文化的自我教育功能就显得至关重要。然而，欠发达地区在这一点却很薄弱。在临沂地区北部6个山区县的行政村

中,近4年来没放过一场电影的有458个,约占行政村总数的8%。这6个山区县的图书馆经费自1980年切块包干以来,一直徘徊在8万元左右,按总人口平均,每人每年只占2分钱,每17人才占有一册图书,而全国是平均每5人就占有一册图书。再从农民自身文化生活消费来看,1986年,全区人均支出8.97元,占生活消费的3.26%,而同期山东省平均为15.94元,占生活消费的4.37%;胶东地区高达35.43元,占生活消费的7.37%。从电视机、收录机、收音机的普及率来看,全区分别为7.5%、1.75%、73%,而胶东地区分别为46.81%、11.1%、86.11%,其差距之大是一目了然的。文化事业的落后,直接造成区域居民文化水平的低下和限制人的素质的提高,导致愚昧、迷信的泛滥。

3. 科技。我们采用数学模型对临沂地区全民工业企业技术水平测算发现,1984年全区反映综合技术水平的A值仅为1.4077,而全省平均为1.6134。在1972—1980年的9年中,全区每年的技术水平递增速度平均为2.17%,而全国平均为3.1%。临沂地区的科技落后是显而易见的。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科学技术的作用并不单纯在于各项经济指标的增加,更重要的是它有着引入新的观念、改变人的价值趋向的多层次功能,它将对整个社区发育起着巨大作用。科技的发展必然带来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带来社会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不断创新,临沂地区科技的落后严重制约了上述变革的进程。

4. 邮电通讯、交通。邮电通讯和交通的发达与否是观察社区封闭与开放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影响社区功能强弱的重要因素之一。它对社区内部人、信息、资金、物资的流动起着重要作用。我们分析临沂地区的邮电通讯和交通,深感这一基础的薄弱。从邮电通讯来看,通讯网的通过深度、分布密度较低,通讯手段较为原始。到1984年底,全区还有30%以上的乡镇没有邮电所,近1000公里的邮路靠自行车,为数不少的农村投递段还实行周三班。1986年全区电话机总数19187部,电话普及率平均每百人0.17部,仅为全省平均水平的2/3。全区人均邮电业务量仅为1.24元,大大低于全省2.28元的平均水平。这一切都严重地制约着信息的流动。从交通方面来看,尽管全区较为发达,但长期以来没有铁路、港口,仅靠公路运输所造就的社会发育的低下还一时难以彻底改变。特别是远离县城、乡镇驻地的一些地方,交通严重闭塞,1984年全区仍有5500多个行政村不通车,占全区行政村总数的一半以上,虽经3年多的扶贫努力,到1987年底还有1200多个村不通车,这一切都将继续阻碍社区总体功能的强化。从现代开放经济的观点来看,邮电通讯和交通的落后,不仅阻碍经济的发展,而且还会造成社会流动缓慢,使人流、物流、信息流难以流转,从而在最终的意义上局限了人的观念和素质的变化和提高,加剧其无知、守旧、不思进取和安于守成。

至此,我们从人的观念、社区功能、社会发育三个方面分析了影响临沂等不发达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各种因素。我们发现了这样一个恶性循环过程:先天不足的社会发育局限了社会与人发展的环境,社区功能的弱化又无法造成与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相联系的频繁流动和体制创新,从而制约着劳动力高层次文化需求的产生和观念的转变,而劳动力本身文化素质的低下和观念的贫困又抑制着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变革,从根本上导致社会求变机制的匮乏。它告诉我们,在历史的长河中变革贫困面貌,不可能单从经济因素而论经济的发展,它是一种社会的总体变迁过程。研究欠发达地区的社会经济开发,必须拓宽视野,在重视经济因素的同时,面对社会机体深层的非经济因素。

四、对策选择：从非经济因素出发的一条思路

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传统农业社区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如果说可以选择一条最佳的起步策略或发展模式的话，我们认为，从根本上讲是由该社区的文化背景和社区结构及功能决定的。发展意味着各种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更合理地重新组合。故此，一切欠发达地区脱贫致富的关键，在于彻底摆脱深深地铭刻于人们头脑中的愚昧、落后、封闭的守旧思想，建立起全新的具有自我积累和自我增长能力的社会经济文化体系，实现社会运行机制的转轨。

欠发达社区的经济开发，一般说来有外力和内力两种形式。落后地区自然条件差，资金短缺，经济基础薄弱，外援是帮助这些地区脱贫的合乎逻辑的举动。1984年，中央发出了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1986年，贫困地区的发展，作为一个特殊部分纳入了整个国家发展计划，社会各界的关心与援助不断地涌向贫困地区，并改变了过去单纯救济的方法，取得了明显成效。我们在这里更强调内力的作用，因为贫困地区千百万群众的参与创造，才是他们摆脱贫困的真正希望。从本质上来说，社区发展是一种自我组织和自我教育的过程。基于此，我们提出几条加快临沂地区经济社会开发的对策。

1. 通过示范效应和家庭经营强化和形成广大农民的商品经济意识。临沂地区由于经济、文化不发达，大众传播媒介缺乏，经验模仿是他们学习新知识的重要途径，应该利用这一特点，通过“示范效应”提高人们的商品生产能力。在目前，要特别重视并组织好家庭经营这个环节。利用家庭经营把千家万户推到商品经济的洪流中去，这对于改变社区内部农民传统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意识以及强化社区功能都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一个好的家庭经营户就是一个示范原型，要充分发挥他们传、帮、带的作用。大力发展家庭经营是加快临沂地区农村经济运转的必要条件。从近期看，家庭经营的范围要从现有的种植业、商业、运输业向工业方向转向，并逐渐扩展到邮电业、信息业、旅游业等第三产业。

2. 社会求变机制的培育。为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经济进步提供创造的机会和求变的动力，培育出利益与现代商品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动力主体和动力体系，这是一项艰巨而长远的社会系统工程。我们认为，知识和技术是达到上述社会目标的契机。人才缺乏、劳动者素质低是临沂地区守着较丰富的资源而致富无门和社会求变机制匮乏的症结。从一个长远的社会目标来看，发展基础教育是提高临沂地区劳动者素质的重要途径。在目前，达到上述社会目标的最有效途径是转变人才观念，放宽用人政策，把现有一切可以有所作为的人才挖掘出来，鼓励科技人员到乡镇企业并多方引进人才。需要指出的是，对于欠发达社区来说，在各类教育中，职业教育和初级教育的比较利益最高，对社区内部求变机制的培育作用也最大。为此，优先发展职业教育和初级教育是极其重要的。

3. 劳务输出和搬迁开发。欠发达地区一般都有着相当可观的剩余劳动力，因此，组织劳力输出是改变这一状况的捷径。临沂地区人多地少，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有计划地组织劳务输出，可以减少人口增长对土地需求的压力，使被破坏的自然资源得以恢复。更为重要的是，劳务输出的直接效果不是近期为本地区带来多少收入和财富，而在于开阔他们的眼界，把先进的文明带回本地，打破社区原来的封闭状态，提高社区功能。因此，积极创造条件，提供信息，广开渠道，多层次、全方位地进行劳务输出是各级政府的重要责任。如在乡镇设立劳务输出办公室或职业介绍所，在一些需要劳力的发达地区建立办事处或劳务公司，以逐步形成固定的渠道。除此之外，还应注意搬迁开发，在贫困地区的就近，选择一

些条件比较好的地方办农工商运企业，把部分劳动力吸引到新开发区来，在那里就业。这项工作比较复杂，可以在小范围内试行，总结经验，然后推广。

4. 提高农村干部的素质。农村乡、村干部的素质对本地区的商品经济意识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在传统农业社区内，农民的日常实践活动多是从从事自然经济的小生产活动，商品经济意识淡薄。而农村干部的实践活动则是在社区内从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活动，他们对政策的理解能力和对商品生产的指导能力直接影响着本地区商品生产活动的开展。我们在调查中所接触到的部分乡镇一级和村一级干部，他们工作繁忙，事务缠身，无暇展开对区域或部门发展战略的思考，也不太注重诸如信贷、利率、税率、价格的变化以及乡镇企业道路的选择等等，加之本人素质和干部制度上的弊端，也使个别人过多地考虑自己工作地位的变迁。因此，提高干部素质对于强化社区功能也是重要的。

5. 继续发展专业市场，强化社区的辐射功能。专业市场是我国现阶段多种经营成分及多种经营方式相互交融，以一定的城乡区域为基地，以大宗专项商品批发为主，并兼百货零售业务的市場交易形式。专业市场的建立除了可以增加流通渠道，减少流通环节，拓宽市场容量，加速商品流转外，还可以此带动信息量大的第三产业的发展，加快小城镇建设的步伐，提高人们的商品经济观念和竞争意识，促进农村剩余劳力转移。一个规模较大的专业市场的建立，相当于建立一个小集镇，可以大大加快市场周围地带的人流、物流、信息流的频率，提高这一地带的社区功能。1987年临沂市自建立纺织品、小百货、小五金、皮毛等专业市场以来，吸引了湖南、浙江、河南、江苏、安徽、福建、河北等8省市40多个县市的客户，仅交通运输部门每年就增加客货运金额300余万元，个体客运发展到50多家，旅馆、饮食等服务性行业增加收入500多万元。在这些收入的背后，更使当地的人们开阔了眼界，而这却是无法用数字计算的。

6. 我们特别强调地区发展战略的制订和社会政策在贫困地区的科学化、制度化和具体化。因为没有科学的、切合实际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对任何地区来说，经济发展的目标、结构、布局和重点都不会清楚，必然会制约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进程。抓好这项工作对社区经济的发展是有益的。另外，社会政策（包括一些具有法规性质的政策），是由党和政府为推动社会改革和社会发展，加强社会控制，根据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制订的，它具有全国性的指导意义。在欠发达社区，群众的理论思维、科学手段、识别政策的能力、预见未来的能力、对政策的理解能力，相对于发达地区来说显得较差。因此，当地政府根据各地情况，将中央的政策具体化将有利于当地人民的理解和实施，使理性的政策决策较快地转化为现实的社会实践。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临沂等欠发达地区摆脱贫困的构思和变革行为，不会是一个单独的近功利行为，它是区域内部社会、经济、文化乃至风俗习惯等多方面的战略综合和总体变迁。因此，仅从经济学角度来探求一个地区的振兴，而忽略社会机体深层的非经济因素，往往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全面地改善社区环境、提高社区功能乃是启动临沂等欠发达地区社会经济新的运行机制的至上因素。

作者工作单位：山东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陈庆利